

走向替代性的旅行理论

闵冬潮

研究表明，社会性别理论大多是从北方、西方流向南方与东方，特别是从美国流向世界其他地方，而反方向的流动几乎都不存在（Costa，2000；Min，2008；Thayer，2010）。即便是在欧洲，美国性别理论的霸权地位也已成了众矢之的（Davis and Evans，2011）。然而，世界上还有许多与性别理论和运动发展相关的“被遮蔽”的路径，它们至今都没人理会。

要探讨跨国女性主义，就不能避开翻译和旅行理论这两个重要问题。理论旅行的过程涉及了隐藏着的权力关系，对这些关系的作用，翻译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学者已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而理论旅行的始作俑者萨义德对此却并未多涉（Said，1984）。于是，翻译理论就从原来的“我们该如何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转变为“翻译是做什么的，它们在世界上如何传播以及引起反应的？”

陈密（上海大学）翻译, translated by Chen Mi, Shanghai University

This research was supported by a Marie Curie International Incoming Fellowship within the Seventh European Community Framework Programme under the project title “Cross-Cultural Encounters—The Travels of Gender Theory and Practice to China and the Nordic Countries.”

(Lefevere and Bassnett, 1990)。如果我们不再将翻译看作是一种隐蔽的实践，那么就要把译者的身影从隐蔽处显现出来，把他们看作是翻译过程中的催化剂。这个焦点的转变意味着，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对译者的智识角色及权力问题的研究已处于最前沿。如此一来，要分析旅行理论就势必要涉及文化翻译的相关理论，并且要面对更为宽广的一些议题，包括理论旅行的方向（由西向东或相反）、目的（文化交流、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以及语言和受众等（Liu, 1995）。

自 20 世纪后期以来，我一直感兴趣的问题是，女性主义及妇女研究的理念和知识为什么会从这里（西方）“旅行”到那里（中国）？它们是如何“旅行”的？我在详细考察理论旅行和翻译在中国的具体情况时发现，跨国翻译包含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

首先是译者的问题。从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在女性主义翻译的对话、协商过程中，介入的译者因不同的利益可分为三类。

80 年代伊始，中国的妇女研究和女性主义思想旅行到中国，进入到为数不多的不再完全被国家和意识形态所占据的学术和政治生活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在 80 年代期间旅行到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想中，大多数是源于 60 和 70 年代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其中以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最为成功。在这个“翻译”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妇女研究的中国学者自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第一类译者”。

“第二类译者”是全国妇联。妇联在 80 年代面临的两难境地是：优先维护妇女的利益，还是优先维护党和政府的利益。80 年代以来，虽然妇联采用了一些国外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的观点，但仍然回避使用“女权主义”的字眼。

但 gender 一词在中国的旅行故事却大不相同，在政治意义上，它的旅程比 feminism 要顺利得多。90 年代，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社会性别”以联合国官方文件的名义被引入中国，全国妇联也很快接受了这种理论话语。gender（性别）一词以新的语言结合并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然而，限于现行的政治体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无力“对话”的局面，妇联不得不放慢对社会性别的“翻译”速度。

这个跨国接轨的“第三（类）译者”，主要涉及到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和海外的华人妇女学者。在将 gender 理论引入中国的组织中，美国的海外中华妇女研究学会（CSWS）是关键的一个。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到 21 世纪初，通过会议、讲习班、翻译、出版及培训项目等方式，海外中华妇女研究学会就 gender 主题与国内妇女研究团体和个人开展了诸多的合作项目。

毫不奇怪，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促进中国妇女研究以特殊的方式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发展”基金的跨国连接起到了一个根本性的作用。在 90 年代，福特基金会在资助重大的妇女研究会议和研讨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除了关于中国生育健

康的重大妇女研究项目之外，福特基金会还资助了农村妇女发展、妇女教育、女性群体流动、妇女法律以及高校女性与性别课程等项目。中国的妇女研究在国内缺少资金来源，故而只能依赖西方和国际上的各种基金会（有时这被视为唯一的可能得到的资源）。这些基金会在资金支持之外，同样也会提供一些理念上的帮助。对于在中国的许多NGO来说，财力和理念上的同步支持一直都是极其重要的因素。¹

我们已经注意到，许多组织、项目、观念和资金都以国际社会的名义进入中国的，但我们多半并不了解或没有考虑到的一个问题是，像“社会性别”、“发展”、“非政府组织”等概念在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议程中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这些话语又如何在国际社会运动中为“社会性别”争得一席之地？之所以要追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发展机制已将妇女当作一种特定的目标群体（Barlow，2007）。

我感到，我们应该提倡一种以更为批评的态度来对待跨国女性主义与发展机构。这肇始于始于海外中华妇女研究会。例如，在2002年初，对于如何维持作为一个女性主义的组织的海外妇女研究会会有一个网上讨论，讨论期间，仇乃华对女性主义与发展领域的不稳定关系有所评论。她认为，一些发展机构打着“性别主流化”的旗号，放弃了性别与发展（GAD）的根本性的、跨结构的议事日程，以政

¹ 基金支持的情况近年来已有所改变。比如从21世纪初开始，国家社会科学及人文研究基金开始支持与性别/妇女研究议题相关的项目，而且获得资助的项目每年都在不断增加。

治正确名义来看待社会性别，而无视“社会性别敏感”的需求。社会性别已成为推进新自由主义发展议程的一个新工具了。发展领域内流行的“培训”一词，将“培训者”与“接受培训者”的等级关系以及西方知识与专家的主导地位合法化了。发展机构的资金同样催生了一批发展专业人员，并在活动者内部造成了裂痕。²在讨论中还提出了“位置的政治”问题，在海外中华妇女研究学会成员中间对此也有讨论（Bao with Xu，2001）。³自那以后，我们也看到中国的性别（研究）专家的成长过程，其中的一些人也开始质疑这个性别与发展机制。

在学术领域，中国的女性主义者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已注意到“旅行理论”与“本土化”之间的权力关系，它意味着知识分布上的不对称。我在十年前写道：“如果说在中国的妇女研究领域中，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讨论已姗姗来迟，那么，为什么其他一些重要的女性主义思想至今仍未旅行到中国？例如，许多有色妇女的著作还没有耳闻（甚至是像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格洛莉娅·安扎朵（Gloria Anzaldua）、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这样的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学者）；东欧、中东、印度和非洲的妇女研究或者女性主义在中国几乎是沉寂的一片，大洋洲、拉丁美洲的女权主义就更不用提了。因此，隐藏在女性主义思想全球流动、出版

² Zhang Naihua, e-mail correspondence, January 2002.

³ Zhang Naihua, e-mail correspondence, January 2002.

和活动背后的权力关系应该被揭示出来了。显然，这是一个需要鼓励开展的新工作领域 (Min , 2002)。

十年之后，如果我们勾勒出旅行到中国的跨国女性主义路线图，那就会发现，美国的女性主义者仍然执理论之牛耳。在这期间，贝尔·胡克斯、阿丽森·贾格尔、南茜·弗雷泽等人的书都有了中文译本，其中，朱迪斯·巴特勒在中国更是一颗“新星”。然而，这是否是学术风尚趋时或过时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抑或一些理论翻译过来就停止了旅行？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我尝试处理这些问题时所面对的现实是，全球化进程使地域差距急剧缩小，现今的理论和理念以前所未有规模和速度移动着，并且通过更为复杂的路线来迁移。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种市场力量之间的竞争使我们没有时间和空间来从容思考旅行理论的加速变化，我们只能被迫从政治上而非从实践上来面对这些。以中国与北欧国家的跨地区互动为例，在这个重要主题上的研究就仍然付诸阙如。目前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刚刚触及边缘，因为对中国和北欧国家以及这两个地区之间的性别理论的跨地区流动至今尚未加以研究，因此也就没能揭示隐藏其中的一些历史。⁴

⁴ 例如，中国—北欧妇女与性别系列研讨会。2002年以来，中国和北欧国家已举办了4次会议，主题涵盖了全球化、人权、跨国女性主义等。然而，这些理论旅行对彼此的妇女/性别研究和妇女运动深入程度有多远，仍有待研究。

现在的问题是，女性主义理论是否已经真正装备好了在深入分析的层面上讨论中国的性别平等问题。我感到，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在近来诸多的社会、政治和理论问题上，恐怕是缺失女性主义研究的身影。比如说，对性别平等和性别差异、《婚姻法解释（三）》以及妇女的参政问题的讨论就非常薄弱。这似乎说明，性别理论的旅行速度大大超乎我们利用这些理论来处理自己的问题的能力。

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学者提出了可替代的认识论：“没有全球的认知正义，就不会有全球的社会正义”（Santos 2006:14）。换句话说，要想对抗占据主导地位的全局化知识生产，取得全球社会公正，关键任务在于发展一种替代的思维。这将是我对旅行理论的新思考的起点。

我对翻译和旅行理论的方法是发展一种**替代性的旅行理论**，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它将在以下各方面促进方法的创新。

1. 旅行理论通常都是关注“旅行者”，即旅行的理论。**替代性的旅行理论**不仅仅讨论理论旅行，它也同样关注理论接受地的人，以及这些人欢迎、采纳和（或）质疑这些旅行来的理论的方式。

对理论接受地的人来说，问题应该是：那些理论是在哪里生产的？从哪儿来？本地的地理—历史和知识生产的比例如何？当地的历史是什么样的？经过旅行地区的差异，这些理论被如何表达？仅仅是用新的方式重述一遍还是要面对其理论

的某种局限性？

2. 大多数旅行理论著作处理的都是与话语有关的问题。**替代性的旅行理论**将包括对这些话语与物质条件之间的关联的研究，这就意味着，它不仅研究书面的翻译和理论，而且还包括与翻译随之而来的实践，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

全球化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快速发展的技术交流和媒体已深深改变了理论旅行的条件（土壤）。正如克纳普（Knapp）所指出，“不反思高度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近的发展，就无法理解今天旅行理论的变化情况”（Knapp, 2005:251）。随着知识和资讯变为高价值商品，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也被资本市场所高度统治，我们都面临压力去生产知识进行买卖。

随着项目基金的全球流动，“社会运动市场”（Thayer, 2010）也跟着出现了。在这个市场中，各种运动和组织都把各自的观点、知识产品和技能拿来交易。资金流动的物质现实同样有着强有力的散漫的方向。在中国，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家已从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支持中抽身而出。在一些地区的妇女运动中，国际上发展援助是不可或缺的。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基金的组织该如何经营下去？摆在各地（北方和南方、东方和西方）女性主义者面前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不受不平等的条件的去创造“社会运动市场”中的平等政治关系？

3. **替代性的旅行理论**还将要探讨,在什么理论会旅行和什么理论不会旅行的背后,权力与影响力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探讨那些没有旅行的理论对于理解什么理论旅行了,以及更广泛地理解跨文化交流的困难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总是有权力在促进一些理论旅行的同时阻碍另一些理论旅行。但是,在中国旅行的女性主义地图中少了一样,那就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经过文革之后的政治转型,原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结构、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被聚焦于经济增长的议程所取代。此后妇女不再被看作是政治财富,而是被当作劳动力或经济负担。结果,中国妇女就得到处去寻找新的支持和方法来参与政治。我们看到,“社会性别”、“NGO”、“妇女组织”等话语成为 90 年代妇女参与政治的新语言的一部分,进入 2000 年以来,“性别平等”和“性别公正”也愈加频繁地被提及。当然,对我们来说,了解和学习那些被遗忘了的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妇女政治参与仍是一项任务。

我希望,通过探讨哪些理论会旅行和哪些理论不会旅行的背后权力与影响力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我们能够创造出一个更为积极的**替代性的旅行理论**。

相比聚焦于某个特定的概念或思想能否被“正确地”翻译以保留原味,鲍温图拉·得·苏撒·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用的是更为积极的方式的来看待翻译这件事。他指出,承认不同语境下的理解的多样性将有助于展开富有成果的

对话。这样一来，翻译就成了考虑到承认世界上不同知识和经验的有效性和可能性的一个过程 (Santos , 2006)。进而，这些翻译理念还将允许创造新的方式和方向以生产可共享的知识。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

&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参考文献：

- Barlow, Tani E. 2007. "Asian Women in Reregionalization." *positions* 15(2):285-318.
- Bao Xiaolan. 2001. "Feminist Collaboration between Diaspora and China." With Xu Wu. In *Chinese Women Organising: Cadres, Feminists, Muslims, Queers*, ed. Ping-chun Hsiung, Maria Jaschok and Cecilia Milwertz, with Red Chen, 79-100. Oxford: Berg.
- Costa, Claudia De Lima. 2000. "Being Here and Writing There: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in a Brazilian Landscape."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5(3):727-60.
- Davis, Kathy and Evans, Mary, eds. 2011. *Transatlantic Conversations: Feminism as Travelling Theory*. London: Ashgate.
- Knapp, Gudrun-Axeli. 2005. "Race, Class, Gender: Reclaiming Baggage in Fast Travelling Theo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12(3):249-65.
- Lefevere, Andre, and Susan Bassnett. 1990. "Introduction: Proust's Grandmother and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ed. Susan Bassnett and Andre Lefevere, 1-13. London: Pinter.
- Liu, Lydia H. 1995.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 - 193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n Dongchao. 2002. "Travelling Theory, Translation and the In-Between: Women's Studies in China 1980s-1990s." PhD dissertat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 . 2008. "What about Other Translation Routes (East-West)? The Concept of the Term 'Gender' Traveling into and throughout China." In *Gender and Globaliz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Method, Practice, Theory*, ed. Kathy E. Ferguson and Monique Mironesco, 79 -10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Said, Edward. 1984. "Travelling Theory." In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226-47. London: Faber & Faber.
- Santos, Boaventura de Sousa. 2006. *The Rise of the Global Left: The World Social Forum and Beyond*. London: Zed.
- Thayer, Millie. 2010. *Making Transnational Feminism: Rural Women, NGO Activists, and Northern Donors in Brazil*. New York: Routledge.